

施伟达 邓伟志
王国荣 朱崇儒
● ● 主编
等编

现代中国
著名人物

现代中国著名人物

邓伟志 朱崇儒 ● 主编
施伟达 王国荣 ● 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题字 屠新时
封面装帧 邹纪华

现代中国著名人物

邓伟志 朱崇儒 主编
施伟达 王国荣 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5 字数 348,000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书号 11074·764 定价 2.60 元

目 录

毛泽东——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朱崇儒 施伟达 (1)

周恩来——

 生为民尽瘁 死有重于山 唯 辛 吴 军 (19)

刘少奇——

 抹不掉的丰碑 王国荣 (39)

朱德——

 于平凡中见光辉 袁 园 (52)

任弼时——

 党和人民的骆驼 吴 军 (65)

董必武——

 革命功高 公仆望重 王国荣 (74)

彭德怀——

 横刀立马彭将军 金维新 (84)

贺龙——

 无畏的元帅 忠诚的战士 王国荣 (101)

陈毅——

 人民的忠诚战士 蒋洪斌 (113)

罗荣桓——

 将军百战身 丰功万古存 黄定奎 (125)

林伯渠——

 党员之模范 足以型后辈 黄定奎 (132)

李富春——

 社会主义经济的杰出“管家” 王国荣 (137)

王稼祥——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第一个提出者 马积华 (143)

张闻天——

 为真理而斗争 马积华 (152)

陶铸——

 他是烈火 他是青松 王国荣 (160)

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沈宝良 庄健 (167)

瞿秋白——

 无限忠诚的战士 赵孝思 (175)

蔡和森——

 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 施伟达 (186)

向警予——

 中国女界的杰出先驱 施伟达 (197)

邓中夏——

 清操厉冰雪 赤手捕长蛇 施伟达 (206)

苏兆征——

 春蚕到死丝方尽 沈宝良 (215)

彭湃——

 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沈伟麟 沈宝良 (223)

陈延年——

 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施伟达 (231)

- 恽代英——
青年模范 人民英雄 施伟达 沈宝良 (239)
- 赵世炎——
浩气如虹万代仰 傅克勤 (248)
- 张太雷——
化作大雷震寰宇 沈宝良 庄健 (258)
- 李立三——
一个三次被追悼的忠实党员 王国荣 (266)
- 方志敏——
千秋青史永留红 施伟达 (277)
- 刘志丹——
裹革沙场 虽死犹荣 施伟达 沈宝良 (289)
- 黄公略——
好教后世继君来 王先城 (300)
- 许继慎——
英勇善战光明磊落的红军名将 谷 良 (308)
- 韦拔群——
壮族人民的好儿子 谷 良 海 华 (316)
- 赵博生——
鲜血染红星 施伟达 (324)
- 董振堂——
把一切都献给党 王关兴 (332)
- 段德昌——
为真理赴汤蹈火 马 跃 (340)
- 杨靖宇——
不屈的抗日英雄 沈宝良 (350)

- 左权——
 太行浩气传千古 沈宝良 (361)
- 叶挺——
 在烈火中永生 沈宝良 (371)
- 宋庆龄——
 国之瑰宝 王国荣 (379)
- 蔡元培——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王国荣 (388)
- 鲁迅——
 民族魂 王国荣 (395)
- 廖仲恺——
 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施伟达 (406)
- 何香凝——
 报国何时尽此心 沈宝良 (414)
- 邓演达——
 孙中山的助手 共产党的挚友 林汉雋 唐燕能 (423)
- 杨杏佛——
 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 陈敬山 (432)
- 沈钧儒——
 左派旗帜 爱国老人 曾演辛 (441)
- 邹韬奋——
 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曾演辛 (447)
- 郭沫若——
 文化战线上的光辉旗帜 川 言 (454)
- 沈雁冰——
 革命先驱 文学巨匠 王国荣 (465)

李四光——

我国科技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沈宝良 海 华 (471)

闻一多——

永不熄灭的红烛 唐燕能 林汉隽 (480)

杨虎城——

爱国将领 千古功臣 曾演辛 (487)

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崔美明 (494)

张治中——

毅然奔向光明 王国荣 (505)

傅作义——

历史记下了他的抉择 王国荣 (511)

毛泽东——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朱崇儒 施伟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从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传出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代表亿万中国人民，在开国大典上把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并亲自启动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是一位英姿勃发、身材魁伟、气宇不凡、五十开外的中年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在学习探索中前进

毛泽东字润之，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贫瘠山村韶山冲。父亲毛顺生原来是一个贫农，因为善于经营，发了家，后来上升为富农。母亲文氏则是一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农家妇女。在这充满着泥土气息的茅舍和田园里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从小参加劳动，而且比别的同龄

人更酷爱读书，稍有空闲就手不释卷。《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他都爱不释手。

十五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读到了一本记述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瓜分中国领土，欺压中国百姓的书籍。联系到平时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祖国在苦难中呻吟，出路何在？这位少年忧国者决心要从探索中去寻找答案。

当毛泽东打听到湘乡县有一所新式的学堂时，就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设法到这所学堂去求学。为了说服父亲，他不仅自己据理力争，还请来了本家的长辈们帮助说情，终于如愿以偿了。一九一〇年初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自己挑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言志”，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面对试卷，一气呵成。他把自己看到的穷人的悲惨生活，民族的危亡和立志救国救民的志向，凝聚在笔尖上，倾诉在文章中。当校长和国文教员批阅到这份卷子时，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学生中竟有这样一位志趣高尚、思想深刻、抱负远大、文笔流畅的志大才高者。他们惊喜万分，感慨地对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人材！”

这所学校，每天早上学生们集合点名时，校长总要训话。经常向同学们讲述中国一天天贫弱，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时事。每当此时，毛泽东总是听得特别专注。学校里还有一位教员，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经常向同学们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富强的情况，也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野心，这些都撞击着少年毛泽东的心，引起他深深的思索。

在学校里，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老师课堂上的讲解，一有空就自己找书读，尤其是那些传播新思想、新见解的书籍和文章，他更加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他读得格外认真，有些都能背诵如流。一天黄昏，在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看到一位同学拿着一本书，走上前去一看，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稍稍一翻，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于是就从这位同学手中借了来。过了几天，当毛泽东将这本书还给那位同学时，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于遭受列强欺侮。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他还抱歉地对那位同学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当那位同学打开书本一看，整册书都被毛泽东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人物如：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琳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那位同学被毛泽东认真读书，勤于思索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师生们，更是无不称道毛泽东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的勤奋精神。在整个学生时代，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涉猎。然而，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学说，毛泽东都不盲从，一本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不过十来万字，他在书的眉头上竟写下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对全书逐字逐句地精读，用墨笔加上圈点。批语中，有的简单地表示赞同、反对和怀疑；有的则加以综合、概括、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直至提出批评和补充。

毛泽东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同时还注意作社会调查，向

实践学习。一九一一年春天到长沙求学以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常利用假期的机会，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他曾邀约好友蔡和森一道，脚穿草鞋，从长沙出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历了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走了半个圈。他们沿途了解各地农民的风俗习惯，了解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榨下的凄惨生活。一九一七年夏天，他邀了一位同伴，走遍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许多乡村。同年冬天，他还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去作调查，接触农民，同农民谈心，获得了大量有益的知识。

这种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养成的勤奋学习的好习惯，不仅使毛泽东日后成了一个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眼界开阔的学问家，更使他在学习中不断地探索前进，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二十八画生启事”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

一九一五年秋天的某个日子，在长沙城的各个学校里，突然发现了一张石印传单。全文不过七、八百字，主要内容是征求有志向，有抱负，求上进，愿意为拯救苦难中的祖国和民族尽心尽力的青年，结为同道。传单末尾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画生启事”这几个字。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张小小的传单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被鼓动起来了。原来这“二十八画生”不是别人，正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此后，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以有志青年和进步教员为核心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诞生了，毛泽东

担任了学会的干事。在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认真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虽是战胜国之一，但半殖民地的地位丝毫没有得到改变，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它们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仍然有效；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继续在加剧；加之兵灾、匪灾，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逐渐萌发了要以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和社会，必须联合更多的同志，结成革命团体，才有力量的思想。新民学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毛泽东亲笔为学会起草了简章，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会员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和时事问题。在毛泽东等带领下，新民学会很快成为有影响的著名进步团体。它无论在组织进步青年了解世界革命形势，学习各国革命经验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中，还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驱除反动军阀张敬尧等一系列斗争中，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年八月间，毛泽东为从事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到了北京。在京期间，他积极开展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活动，与此同时，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职员，在那里他有幸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的抱负、理想和才智学识，亦深受李大钊的器重和同学们的佩服。工作之余，他坚持刻苦自修，并拜访一些学者名流，从那里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和见闻。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了。不久，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当他

第二次到北京时，已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了，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古老的北京正呈现出新的势头。毛泽东经常同李大钊一起研讨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他想方设法寻找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近况以及谈社会变革的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和钻研。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和严酷激烈的斗争锻炼，毛泽东迅速摆脱了各种社会思潮和流派的影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这时，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非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而要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仅有新民学会这样的团体是不够的，必须建设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于是，他与远在法国的蔡和森通过频频的书信往来，饶有兴味地就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建党问题，展开了认真的探讨。他本人则在湖南，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会，创办文化书社，主编《湘江评论》，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开办工人夜校，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

这是一个秋凉的日子，在湖南长沙城郊的一个小丛林里，毛泽东和走在他身边的何叔衡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筹建湖南党组织的大事。原来，不久前，毛泽东和何叔衡刚刚从上海回来，他们是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讨论。经过毛泽东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党支部正式成立了（后称“湘区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书记。

党的建立，给湖南的革命运动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一九

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同年九月，一万七千多人的路矿工人大罢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旗开得胜；同月，粤汉铁路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保护合法权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十月，长沙四千多名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争取营业自由的罢工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农民运动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轰轰烈烈的斗争实践中，湖南党的组织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长沙的许多工厂和学校也都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中共湖南地区（包括江西省安源等地）委员会也很快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从此便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更加自觉与满怀信心地献身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由于毛泽东的非凡的组织才干、杰出的马列主义素养和优秀的工作成绩，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建立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艰巨工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严肃，会场设在汉口市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现为鄱阳街一三九号），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此刻，毛泽东正在会上作重要发言。他那严肃的语调、精辟的分析，不时带着一点幽默，深深吸引着每一个与会者：我们“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

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是在非常情况下召开的。自从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实行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国内革命形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农民运动来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等十多个省、区。仅广东就有六十一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六十多万人；湖南省则有四十四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曾利用回家乡养病的机会，深入农村调查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仅韶山地区就有二十多个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的武装北伐也取得了节节胜利。然而，陈独秀把持的中共中央却坚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反对农民运动，放弃武装斗争和对革命的领导权。在中共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曾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并就这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但由于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的错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越来越嚣张。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白色恐怖席卷而来，工农运动受到严重摧残，大革命遭到失败。

面对着危急的革命形势，毛泽东毫不气馁。他和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一起，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剖析和批判。就在“八七”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

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八七”会议结束了，毛泽东当选为临

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象往常一样，他迈着坚定、沉着的步履，从容不迫、成竹在胸地离开了汉口。这一次，他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肩负着中共中央委托的重要使命，奔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起，搭乘一列驶往长沙的货车。这时，长沙城里到处笼罩着腥风血雨的恐怖气氛，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壮烈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幸存下来的共产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毛泽东机警地时而提着篮子装作买菜，时而扮成军官，外出调查。他亲自出席各种会议，草拟文稿，找人谈话，筹集枪枝和弹药，常常彻夜不眠。当完成了对中共湖南省委的改组工作和对秋收起义的周密计划后，作为秋收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又身着旧青布工人服，风尘仆仆地赶往安源。因为，当时中共所领导的湘东赣西的革命武装，主要集中在修水、铜鼓和安源这三个地方。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怀着数千年当牛作马的旧恨和对蒋介石、汪精卫大屠杀的新仇，端起步枪鸟枪，挥舞梭镖大刀，向着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猛烈冲杀，一场工农武装革命的巨大风暴，迅速席卷了湘东赣西的广阔原野。

秋收起义后不久，国民党军唐生智的新八军向起义的队伍包抄过来，经过一番激战，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损失。鉴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果断地发出命令，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把起义队伍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去。九月二十日早晨，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了全体战士们：“我们是一支工农武装，